

政變防範論

● 王聖寶 著



ZHENGBIANFANGFANLUN

學苑出版社

政变防范论

王圣宝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变防范论/王圣宝 著 -北京:

学苑出版社,2004.8

(学苑文丛 王克臣主编)

ISBN 7-80060-070-X

I.政… II.王… III. 政治理论-政变论-研究-读物
IV.I0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1163 号

书名:政变防范论

作者:王圣宝

出版:学苑出版社

发行:学苑出版社 发行部

责编:歌 夫

地址: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炎黄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厂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数:250 千字

印张:9.65

版次:2004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书号:ISBN 7-80060-070-X/I.054

定价:29.80 元



王圣宝，男，1948年10月出生，教授，安徽和县雍镇乡五房村人。1978年乘恢复高考的东风幸运进入大学，在校读书期间《文汇报》曾以《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王圣宝业余研究扬子鳄颇有见地》为题披露了初步研究成果，其后北京的《自学》杂志以《推荐王圣宝》和《芜湖日报》以《他迷上了扬子鳄》为题相继报导。

1988年被推选为芜湖市第十届人民代表，2003年被直选为芜湖市鸠江区人民代表。在担任经济管理系主任期间，使该系先后荣获安徽省高教系统先进教学单位和安徽省高教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数次应邀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讲授《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

《中国文化史概论》、《无神论史》、《政治学》、《公共关系学》、《大学语文》、《写作知识讲座》、《系统论讲座》等课程。主要著述有：《政变论》、《文化源流论》、

《技坛拾贝》、《中国古代美人传奇》、《游侠风流》、

《拍马小史》、《红白警世录》等。

谨以此书献给：

患难相依、相濡以沫的胞兄
王志勇！

内 容 提 要

古今中外,王国不断灭亡,朝代不停更替,唯政变千古常在。政变就象一个恐怖的幽灵,游荡在世界各国政治舞台上,影响着社会历史的进退,成为不可等闲视之的社会政治现象。然而,研究者寥寥,《政变防范论》与《政变论》是研究政变学仅见的两本学术专著,填补了政变学研究的空白。

《政变论》1994年香港中华书局出版,取古今中外历史事例,纵横论述,全方位地分析了政变的类型、特点、性质、规律、作用和原因。

本书《政变防范论》与《政变论》为姊妹篇,综述了五千年阶级社会人类发明的种种五花八门的政变防范术,研究了各种政变防范术防范政变的得失,对比讨论了各类政体同政变发生与制约的关系,指出一切实质性专制制度,无论古代的君主专制制度,亦或近现代具有专制集权性质的共和制、总统制和军事独裁制等,都是政变的温床,无不政变迭起,防不胜防,唯有最高权力机构采用制衡机制的政体,才能制约政变的发生。同时,本书还从学术的角度,论及林彪念“政变经”防范政变和林彪政变,以及林彪政变带给人们的启示。

序 论

一个意想不到的狰狞怪物，竟在阶级社会来临之际、国家出现之始、阶级统治初登舞台之时，突然降生问世了！这头怪物，就是政变。政变就象一个恐怖的幽灵，游荡在世界各国的政治舞台上，纠缠着舞台上的主人，干着种种恶作剧，不肯离去。政变又似一只凶猛的饿虎，窥伺时机，随时扑向猎物，不知多少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成其口中物，腹内食。而且，古今中外，王国不断灭亡，朝代不停更替，政变却不因亡国而遁迹，不为朝代频更而隐退，反而是千古常在。比较而言，土崩之势难成，政变之局易就。虽小民皆为敌国而土崩，情势堪忧，然土崩瓦解式的大厦之倾，百年难遇，而政变则不期而至，防不胜防，又多血溅丹墀，倾刻覆巢的惨祸，因而更可惧。是故，统治阶级，尤其是最高统治者怵怵于心者，政变也。

然而，政变虽闹得统治阶级坐无宁日，直接影响着治国方略、大政方针的实施与推行，因此也影响着社会与历史的进退，成为不可等闲视之的历史与现实的社会现象，却不知何故，学术界反倒冷落了它，缺乏应有的重视与研究。且看 20 世纪中国学术界在政变方面的研究是何等的凄凉寂寞！《七十六年史学书目》收集自 1900—1975 年间的中国学人著译的史学著作九千余种，算是汗牛充栋了。书目共分二十类，可谓不失包罗万象。可是，独不见政变一目，也不见论述政变的一文一著。接着，《1900—1980 八十年来史学书目》问世，新增条目三千七百七十四条，上下编共分二十六大类，仍不见政变条目。近十余年，有关政变问

题的学术研究，依旧寥寥，唯见一二研究某次具体政变的文章，而作为总体的、系统的、通论性的著述，尚未面世。值得一提的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于政变问题，闻者如谈虎色变，论者则望而怯步，连黎民百姓也不敢把政变问题作为饭后茶余的谈资。政变已经成了学术研究的事实上的一个禁区，谁也不敢问津。尽管“文革”结束经年了，遗传还在，余悸犹存，禁区未开，涉禁者寥若晨星。

如果说特殊的政治气候，禁锢了近百年中国学术界对政变问题的研究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对于世界各地学术界不甚重视政变的研究而几乎沉寂了数千年的状况，就颇费思议了。纵观历史，管窥所及，未曾发现一本研究政变的通论性专门论著。然而，未出现专门论著不等于无人研究。中国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几乎皆言政变，尤其是韩非、慎到等人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他们仅着眼于研究如何防范政变这一政治目的，学术性研究的意味较淡，而从学术角度研究政变并成果较丰者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充实了他开创的政治学内容，写入了他的《政治学》教本。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正值古希腊城邦国家危机重重，走向衰亡没落之际。他目睹了这一现实，看到了政变频仍是危机加深和矛盾激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为了挽救奴隶制度的衰亡，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亚里士多德不仅从158个希腊城邦国家的比较中，研究了城邦国家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国家的起源、目的、任务和性质，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体等，提出了关于国家的一般理论，而且特别讨论了政变问题，比较研究了雅典、斯巴达等几个主要国家的政变，叙述了政变概况，探讨了政变原因，提出了防范政变的措施。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朝着总体和系统方向研究政变问题迈出了第一步，后世学人在这方面获得的成果未有出其右者。只是由于人类刚刚步入阶级社会的伊始阶段，以及希腊城邦国家的固有特点，致使政变的庐山

真面目还没有尽显,若隐若现在云雾层内,从而限制了亚里士多德观察政变的视野,也限制了他对政变规律性的探索,尤其是他无法看到后世二千多年的异彩纷呈的政变。因此,他关于政变研究的总体把握不够全面,也不可能全面,缺乏应有的广度和深度,诸多论点得不到充足论据的支持而显得苍白。

自亚里士多德之后,有关政变问题的论述,散见于阿奎那的《论君主政治》、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旧译《君主论》又译《霸术》)和《佛罗伦萨史》、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罗马盛衰原因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等著作里。不过,大多浮光掠影,蜻蜓点水,一带而过。可见,他们在这方面并未潜心研究,所以也就没有多少人入木三分的见解。此外,还有一些就某次具体政变发表的论著,如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蒲鲁东的《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等,但也都是只见树木不睹森林而已。

倒是古代中国贡献了两部涉猎政变的宏制巨著。一部是《春秋》。《春秋》是鲁国太史世代相袭,逐年逐月秉笔登记的档案,朝报邸抄一类的记录,因此是一部编年史,多称为中国编年史的鼻祖。可是一经孔子笔削则成了他的专著,皆云孔子作《春秋》。虽“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但备载春秋政变:“《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其社稷者不可胜数⁽¹⁾”。如此,数千之“指”中,记叙政变,其实为其主指,因其目的在于使“乱臣贼子惧⁽²⁾”。孔子作《春秋》,惜墨如金,尚无传付之,“使圣人闭目思之,十年不能知也⁽³⁾”,后人谁也不能领略其微言大义,而为何记叙政变却不吝笔墨呢?孔子之世,礼崩乐坏,政不在天子而在诸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更甚者,诸侯政移,“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政治危机日益严重,其重要标志就是政变纷起,阊墙相争不断发生,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变高潮,许多诸侯在政变中身亡继绝。同时,春秋之际各国争霸,弱肉强食,一些城邦国家

纷纷灭亡。孔子当然不会无视严峻的政变现实。在他看来,政变之所以发生,因三王之道废而不明,乱臣贼子由是而作。所以,他要用《春秋》来惧乱臣贼子,遏其萌心,防止政变,达到“存亡国,继绝世”,恢复周公之制的目的。另一部则为司马光奉宋英宗“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之旨主修的《资治通鉴》,历时十九年而功成;工程庞大,成书 294 卷,卷帙浩瀚,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所谓“修历代君臣事迹”,无非是撮集历代治国得失,尤其是熔汇君臣之间篡逆僭弑和防止僭弑的“事迹”于一炉,以为史鉴。通览《通鉴》,司马光不辱帝命,“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⁴⁾”,且对于“元凶宿奸,贬绌甚于诛殛⁽⁵⁾”。所以,书成之后,立即受到宋朝最高统治者的褒奖。宋神宗赐书名曰《资治通鉴》,因其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有利于防篡。为什么宋朝开国不久,统治阶级急急忙忙要修一部《春秋》性质的大书呢?这不仅因为政变恶魔肆虐无忌、猖狂之极,而且由于隋唐五代又形成了一次政变高潮,特别是近在眼前的五代,政变如走马灯似的更换着帝王,并使每一个朝廷都成了短命鬼。五代时有五个小朝廷相继登台演过戏,演得时间最长的是梁,17 年,唐次之 14 年,晋又次之 11 年,周不足 10 年,汉最短不足 5 年。五代先后历时 54 年,其间共发生政变近 20 起,平均不到 3 年发生一次。更何况赵氏政权本身就是靠夺孤儿寡母之政的政变得来的,因此对政变格外警觉,防范得格外严厉。北宋一开国,马上采取释兵权、削藩镇等措施,防范政变。谁知,防范得如此森严壁垒,政变却在悄悄地准备。“烛影斧声”,出奇不意,暗算了宋太祖⁽⁶⁾。为此,北宋统治阶级为警戒“元凶宿奸”,防范政变,才急忙纂修《通鉴》一书。然而,《春秋》、《通鉴》虽涉猎政变,但仅仅是记述,而非学术性研究,充其量也不过是经过剪裁拼凑而成的两部承前启后的“政变史”,根本没有对政变进行一番总体的、系统的研究,因而称不上是学术性专著。

虽然如此,自《通鉴》后,中国再没有出现一部类似“政变史”性质的史书了。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不讳言政变,反面给予相当的注意。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发动了政变,推倒了议会制共和国,实行军事独裁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在政变后,立即著书立说,发表文章剖析波拿巴政变。从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不足3个月的短短时间内,马克思撰写了长达7万余言的名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这部名著里,马克思详细记叙了政变经过,深刻分析了政变原因,尤其是用辛辣笔触揭露了大骗子波拿巴的种种政变伎俩,指出政变后的波拿巴王朝,实质“是农民的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⁷⁾”。这次政变对于法国历史的进程,当然是件坏事,但马克思指出波拿巴政变将有利法国革命的彻底进行,为“完成另一半”革命准备着条件,从而帮助了无产阶级认识这次政变的实质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这部著作和高度赞扬了马克思对政变的分析:“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紧接着一个事变之后,这个事变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整个政治界,有的人出于道义的愤怒大声诅咒它,有的人把它看作是从革命中解救出来的办法和对于革命误入迷途的惩罚,但是所有的人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的⁽⁸⁾”。而且恩格斯也及时发表文章,进一步剖析这次政变,指出波拿巴政变后建立的帝国的反革命性质:“1848年6月的失败使法国并且通过法国使整个大陆具有这样一个反革命势力的方向。现在建立起来的拿破仑帝国不过是近三年来反革命势力的一连串胜利的顶峰⁽⁹⁾”。因为这次政变对法

国乃至整个欧洲政治形势有重要影响,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继续考察政变后政府的所作所为,并进一步搜集材料,以便“根据这些材料就能对那个目前正在尽力玷污拿破仑名字的人的现状和命运作出正确的结论⁽¹⁰⁾”。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政变问题是何等的重视!他们是把政变问题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与研究的。从研究政变的学术性角度来考察波拿巴政变,发现这场政变是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下演出的一次有声有色、有血有肉的政变活剧,是反对资产阶级统治权推翻议会制共和国的一次公开的赤裸裸的帝制复辟活动,是近代社会中一次比较典型的政变。而且,无独有偶,六十五年后的中国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同波拿巴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棋高一着,计高一筹。不过,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名著,也只考察了一次具体的政变。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详尽地考察和研究了波拿巴政变,却未给政变下一个明确的定义。那么,什么是政变呢?从许多史料来理解政变的含义,当指政权的更迭或易手,以及大政方针乃至国策的改变。广而言之,人民革命推翻旧政权和统治阶级内部非正常的更易政权,均谓之政变。在狭义上,独指后一种情况,亦即宫廷政变,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政变。这种狭义上的政变,除了篡弑僭逆,其它如更改前朝带根本性的执政大臣,例西汉吴王濞请诛晁错,南宋杨皇后、史弥远密谋于玉津园暗杀韩托胄之类;以夺大宝为目的的诸侯叛乱,如西晋八王之乱,明初靖难之役,法国“三亨利之战”等例;藉奴隶起义、农民起义或人民革命运动之势而窃国者,如小亚细亚的阿里斯托尼库斯踏着奴隶的尸骨夺取培尔加姆王国政权。沙俄留克里王朝的一批贵族借农奴和哥萨克人民起义的力量,把伪底米特里推上了沙皇宝座,隋末农民大起义风起云涌之际,隋朝太原守将李渊乘势起兵而得主天下。正因此,政变同人民群众反抗运动、起义、革命,常常交

织在一起,难以分出一个清明的界限,故亚里士多德常把政变与革命混为一谈。诸如此类均应属籍宫廷政变的范畴。正因为宫廷政变属于非正常政权更迭,故自古以来便被目为不光彩不道德的行为,以致人们羞言政变,小视政变者。而且,由于政变忤了传统道德,逆了传统心理,违了统治阶级法律,乱了帝王的继统常规,所以往往招致社会舆论的非难,特别会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的激烈反对,甚至会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激起反政变浪潮,导致社会动荡,摇晃政变者夺得的政权,并且还会出现效尤者步其后,尘来一个东施效颦。因此,聪明的政变者总是千方百计粉饰自己,施尽解数往身上披带袈裟,预防反政变。诸如:禅让。这是一着高招,妙不可言,一下子就把劫夺者的面目掩藏了起来。你瞧:是当位者能力不足以治国安邦平天下,自愿让贤,非我夺也!而且,却之不恭,更何况为国为民,理应受之;若不受,岂不负了天下?接受禅让,才合乎天理,顺于民心。如此一来,谁还骂劫夺者呢!多么聪明的反政变的防范措施呀!防范反政变的另一绝招是求助神的光环的照耀,是政变者把自己打扮成合法君主的又一锦囊妙计。由于人民群众无知与愚昧,特别是在宗教迷信盛行的国家,政变者不会忘记告诉人民,他们弑逆篡夺是受神的指使。神意不可违,政权之得,天经地义,愚昧无知的国民当然也就马上俯首称臣了。另外,政变者把自己说成合法的继承人或帝王的后裔,也是一帖常用的药方。古代世界各国在政权继统问题上,出现一个共通的怪现象:不论帝王后裔怎样同室操戈,互相杀伐,争夺权柄,都不会引起多大的非议,而且不论其中哪个夺得政权,都能很容易被社会心理承受,很少落个僭逆的罪名。如果异姓入主,则立刻受到“大逆不道”的责难。于是扼腕之士愤愤而起,兴师问罪之徒随之而来,致使政变者即便成功,其政权也不稳固。造成这一共通的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家天下世袭的结果,同时也由于统治阶级的不遗余力的宣传,形成了传统的社会

心理所致。故而异姓政变者更是常常冒充帝王子孙,合法的继承人,因为这种方法时常奏效。伪底米特里因此登上了沙皇宝座,但不久又被政变者弑夺,然而又出现了一个伪底米特里。波拿巴是一个假波拿巴,可他正蹈此光,“路易?拿破仑胜利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他是依靠同他的名字相联系的传统才得在一个短期内保持住法国社会中相互斗争的阶级之间的均势⁽¹¹⁾”。甚至连一个释放的奴隶,因其诈称为前保民官的儿子而被选为公元前99年的罗马保民官。更有甚者,古罗马后期的许多养子、继子因其养父、继父为独裁官或奥古斯都而平步青云,或者继承上台,或者政变夺位,多数人竟能受到承认和拥护。当然,靠军事力量维持政权的武人当政时期,他们全凭手中的武力频繁政变,根本不需要冒充什么帝王后裔而把自己扮成合法的继承人,如中国五代十国和罗马的帝政时代便是。对于昏君暴主,政变者更容易粉墨登场,多半打着为民除暴、代天行罚的旗号发动政变。救世安民,俨然一付救世主的姿态。如果既不昏又不暴,政变者欲夺其政,便采用布散谣言来丑化、污损为政者,造成一个其政该夺的假象,然后夺之也就顺理成章,不会冒太大的风险了。政变者为了使其政变合法,时常在政变后强迫法律宣布自己合法,如罗马的苏拉、恺撒、屋大维等人都是这么干的。采用非常规的、不合法的、多数又施以屠杀的极残酷手段夺人天下的政变者,拼命涂脂抹粉,竭力变非法为合法,力图尽一切可能摆出一付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之态出现于众前,可谓挖空心思!这类反政变的防范措施之多,远不止上面列述的几例。不过上面,是古今中外政变者通常所用的一般掩饰方法,用来防范反政变,确保政变后夺得的政权的稳固。政变者之所以绞尽脑汁设计反政变防范措施,固然为了稳固政权的需要,而更主要地则是慑于传统的社会习惯、道德、心理。传统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习惯的力量是最可怕的力量。而传统的习惯看法,则把政变与非法、不道德、残忍、罪恶等

联系在一起。形成的历史积淀是：政变就是罪恶，是件应当受到诅咒的极不光彩的坏事。正因此，“政变反动论”曾在中国拥有一个很大的市场，风行一时，甚至连“政变”一词也变成贬义的了。政变者当然不得不粉饰一番以防反政变了。也许，关于政变的学术研究之所以不昌，上面所述，也是一因吧。

政变研究，在学术的苑囿里，既不能同群芳争艳，更不可与修竹比高：而在如何防止政变的研究领域，倒是花团锦簇，虽十之八九为无果之花，但风景还是好看的。这是统治阶级悉心培育的结果。

统治阶级中的政治家、思想家们热衷于政变防范术的研究，替帝王们设计出一套又一套的防范措施，向最高统治者开列了一帖又一帖防范政变的良方。其中有理论的、道德的、法律的、组织的、机构的，有临时性的，也有长久形成制度的，有假仁假义的，更有凶残狠毒的，五颜六色，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许多帝王综合运用各种防范措施，形成近乎全方位的防范系统。他们以为这样一来，便可阻塞政变者的可乘之隙，扼止篡弑僭逆的发生。可是，事情往往与主持者的愿望相反。名目繁多的防范术，花多果少。甚至，政变者正是利用了防范术发动政变，变防范术为其篡弑的护身法宝，唬人的虎皮。帝王将相、统治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们，压根儿没想到，当他们全力以赴建立专制独裁制度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为政变耕耘、播种。君主专制制度象孕育野草的原野，政变在这片原野上发芽、生长和蔓延。在这样的制度下企图防范政变，犹如锄地、烧荒一样，怎么也除不尽的。一遇气候，则“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有土壤存在，就会生长野草，只要专制制度不去，政变就有了生长的土壤，也就不要天真地期望有朝一日会控住政变这头恶魔，赶走这只恐怖的幽灵。政变与专制制度结下了不解之缘，是专制制度衍生的特产物，依赖专制制度这片原野提供的土壤而尽兴生长，寄生在任何具有专制独

裁性质的政体内，因此与专制制度同在。而统治阶级越畏惧政变，越发强化专制制度，而越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越是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政变越容易发生。这一政变的发生规律，古今中外概莫例外。无论君主专制，独裁专制或寡头专制，也无论挂羊头卖狗肉的假民主共和制，或者不完善的民主共和制，也不管是哪个阶级执掌政权，只要是高度集权性质的制度，都会成为政变的栖身之所，政变在这里极易发生，要想防止，无异于痴人说梦，只不过迟早而已，必然发生才是确定无疑的。翻开现代和当代的历史画卷，其中政变之多，直如丛生的野草，而且多数发生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军事独裁和其它形式的专制独裁国家。现代专制独裁国家的政变风潮，进一步说明了古代专制帝王留下来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各样的政变防范术，并不是传家宝，不仅失灵于当时，而且失效于当今。纵然如斯，却不能一概否定统治阶级精心炮制的那么多政变防范术的防范作用。尽管花多果少，或者果实尚未成熟，但毕竟挂出了三两颗。在这方面颇有作为和成效的，是历史上坚持民主共和制的奴隶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则稍胜一筹。

历史上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在防范政变问题上花多大的气力进行研究，而主要是研究如何防止君主专制制度的重演，如何防止独裁政治的再现，读一读《联邦党人论文集》，便可清楚看见资产阶级对于君主专制制度是何等的深恶痛绝，以及胜利后的资产阶级对专制制度的余悸。而铲除了专制独裁和任何形式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后，也就铲除了政变赖以存身的土壤，起码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政变作祟的机会，如美国等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就是一些“不需要害怕政变的国家⁽¹²⁾”。这大概是执政的资产阶级始料未及的一个意外收获。当然，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也对如何防范政变问题进行了许多探讨，因为他们不但害怕本阶级的政权在政变的颠沛中不稳固，而且更加害怕地主阶级和

旧贵族利用政变来恢复君主专制制度，同时，他们自己也是发动政变的行家里手。他们着眼于铲除君主专制制度，从而捉住了问题的要害。治病治本，方可驱逐病害。在专制制度下防范政变，莫过于治病治标，标去而病依然。这并不是说，象美国这样一些执政的资产阶级已经一劳永逸地根治了政变，因为美国资产阶级执政才二百余年，其间几度出现政变危机，而罗马共和时期曾有四百多年岁月基本上没有发生明显的政变，但后来军事独裁倾覆了共和政体，进入了帝国时代，政变马上接踵而至，就象翻斤斗一般，一个紧跟着一个翻完了罗马帝国历史。诸如美国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能否真正彻底摆脱政变幽灵的侵袭，还要看民主势力的消长和历史的检验。至于无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关于如何防范政变问题，留给我们的著述所见不多。马克思、恩格斯之世，无产阶级仅作了 72 天的无产阶级专政尝试。这么短暂的政权，政变来不及光顾，而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主要是创立马克思主义，制定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和纲领，并没有为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设计预防政变策略和措施。列宁毕其一生，为着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苏维埃政权奋斗不已，取得了无与伦比的伟大胜利。因为无产阶级即将掌握政权，也为了同考茨基之流斗争的需要，列宁对于国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在国家问题上，列宁见人之未见，进一步论证了恩格斯关于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国家自行消亡等观点，提出了“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无产阶级必须掌握这个机器直到阶级的消灭等一系列著名论断⁽¹³⁾，从而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可是我们也没有看到他涉及政变及如何防范政变问题。更为遗憾的，是列宁过早地告别了他为之奋斗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由于过早逝世，加上当时形势迫使他把全部精力，投放到对付内外反革命联合绞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这个生死存亡的大事上，以致他无暇留意政变及其防范